

必要與艱難——張放解嚴後小說身分敘事探析

侯如綺

摘要

五〇年代的臺灣文壇被外省作家所把持，而這群作家解嚴之後，一直到新世紀還能保持豐沛創作量並且持續出版的實不多見。作家張放屬這群外省小說家中的異類，數十年來他寫作不輟，創作量驚人。本文考察何以當許多第一代外省作家紛紛停筆，張放仍持續寫作。論文企圖分析張放小說中的身分敘事，理解其內在和外緣的因素，並兼而闡述張放小說敘事的精神價值與主體建構的意義。

分析後本文發現張放反覆寫作的用意在於關注 1949 年來臺的外省人，特別是底層的知識分子以及老兵的集體命運。他們在探親開放與解嚴之後開始清楚覺知國共內戰、白色恐怖與兩岸隔絕所帶來的惡性結果，戰爭框架的瓦解失靈，使得張放重新思索他們一代遷臺者如何被認識與記憶的歷史課題，其中充滿不被理解的憂愁，也暗藏空虛落寞的邊緣人心緒。另一方面，他的晚年寫作不僅是出自於心理創傷的揭露和歷史的檢討，也是為包含自己在內的外省人的未來尋求解答。他自敘事中重建了「老芋仔」熱情、樸實的形象，積極、勤奮、感恩的「替代故事」成為張放的桃花源，也幫助他找到了文字的歸宿和永恆的心靈王國。

關鍵詞：張放、外省作家、身分敘事、老兵、1949

2018/7/19 收稿，2018/11/26 審查通過，2019/2/5 修訂稿收件。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老芋仔』本色——張放解嚴後小說的身分敘事研究」(Most 105-2410-H-032-079-) 之部分成果。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致謝。

** 侯如綺現職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DOI:10.30407/BDCL.201912_(32).0008

Necessity and Difficulty: The Identity Narrative of Zhang Fang's Novels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Hou Ju-chi

Abstract

The Taiwanese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50s were dominated by provincial writers, although it was rare among these writers to maintain the level of creativity and continue publishing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until the new era. Zhang Fang was the exception among these provincial writers who moved to Taiwan. He wrote for decades and produced an incredibly large number of works.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why Zhang Fang continued writing even though many other provincial writers stopped. It analyzes the identity narrative in Zhang Fang's novels, examin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piritual values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s therein.

The study finds that Zhang Fang's works repeatedly focused on migrants who moved to Taiwan around 1949, with the collective fate of working-class intellectuals and veterans as the main theme. They began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civil war, the White Terror and the vicious consequences of the cross-strait isolation after they gained permission to visit relatives in mainland and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The collapse of the frames of war made Zhang Fang re-think historical topics regarding how this generation of migrants should be known and remembered. His novels tell stories of the migrants' sorrow due to lack of understanding by others and of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emptiness and loneliness felt by them as social outcasts. On the other hand, his later writings were not only about the revelation of psychological traumas and examination of history, but also to seek answers for the generation of migrants who moved to Taiwan around 1949, including himself. In his narratives, he reconstructed the enthusiastic and simple images of the veterans. The “alternative stories” of the migrants’ positivity, hardworking and gratefulness became Zhang Fang’s utopia, and helped him to find his destiny as a writer and attain eternity in the spiritual kingdom.

Keywords: Zhang Fang, provincial writers, identity narrative, veterans, 1949

一、前言

1945 年日本戰敗，歸還臺灣。短短 4 年內，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失利，國民政府退守臺灣。臺灣在戒嚴之下長期處於備戰狀態之中，媒體受國民政府的威權主導，文壇也響應戰鬥的主旨，出現大量的反共戰鬥文學。而臺灣本土民眾因為在「反共」經驗上的缺乏，且加上戰後日文與中文語言斷裂的問題，使得原來在文壇耕耘的臺灣作家因為無法跨越語文與經驗的障礙，不得不中止了文學創作；也因此，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提出五〇年代的文壇乃是被 1949 年來臺的外省作家所把持的看法。¹

臺灣社會邁入解嚴之後，第二代的外省作家已經在文壇嶄露頭角，他們書寫族群的獨特經歷，寫返鄉探親、寫眷村經驗與過往、寫流亡離散而至安家落戶的上一代、寫他們離開眷村後的心理等等。以往黨國威權時代之中，外省族群多以「忠黨愛國」的形象被集體認識，甚至被視為是黨國的附庸，而忽略其中的異質性以及複雜深刻的心理樣貌、生命歷程和生活形態，外省族群重寫自我形象，我們可以把他們的族群書寫視為是解嚴後「後殖民」書寫的一環。然，相對的，昔日被目為「把持文壇」的第一代遷臺作家呢？當臺灣社會進入解嚴的時空後，即使是他們之中較為年輕的，也已經進入耳順之年。60 歲之後，一直到新世紀，還能保持豐沛創作量的第一代外省小說家已經相當有限，這除了因為進入老年生活之後仍要維持寫作勞動的生活形態與創作熱情委實不易；另一原因是文學場域生態丕變，要在審美形式上日益求新求變的九〇年代文壇取得讀者與學界青睞，並且獲得出版支持也已越見困難。

而作家張放則屬這群第一代外省小說家中的異類。²他的創作量驚人，光是小說此文類，從 1954 年出版小說《奔流》至 2013 年，便發表過四

¹ 外省人此稱原是用來標示 1949 年左右由大陸來臺的非本地人，有「省外」的人的意思。時至解嚴之後，「外省人」已經在臺安居落戶，下一代亦在臺灣成長邁入壯年甚至也步入老年，臺灣已經成為他們的「家」，以「外省」一詞稱之，就內涵意義而言已不適切。本文所稱的「外省人」乃就長期以來的普遍稱呼以及能夠顯示出其族群歷史的稱謂而言，而非有標籤化之意。此外，本文稱為 1949 年來臺的外省人，「1949」只是一個代稱性的說法。第一代外省人來臺時間未必都在 1949，1949 前後、一直到五〇年代都有自大陸陸續離散至臺者。為求行文方便，不致冗贅，以下皆以 1949 為時間代表。

² 張放，山東省平陰縣人，1932 年生，卒於 2013 年。17 歲時捲入國共內戰，1949 年登上濟和輪，抵達澎湖漁翁島，和八千多名山東聯合中學學生，非自願被編入陸軍 39 師，在

十餘部作品。³相較於張放同年代的作家在晚年紛紛減少創作，張放仍筆耕不輟，忍受孤獨，40年如一日，解嚴之後持續發表小說27部、散文與評論數十本。幾乎是以一年一本的速度發表小說創作，維持著豐沛的創作能力直到過世，其中《台北茶館》與《豔陽天》甚至都是張放逝世那年出版。⁴

從張放的生平看來，他代表了1949來臺從軍爾後在地定居的一個典型，其文豪邁熱情，其人又深沉複雜，他有大時代的共性，也有他個人迷人的光采。本文考察何以當許多第一代遷臺作家紛紛停筆，張放仍孜孜矻矻，寫作不輟？本文企圖由張放經歷與其小說的分析，理解其內在和外緣的因素，並闡述張放小說身分敘事的精神價值與主體建構的意義

二、歷史創傷的來源與歷史揭露

1987年解嚴時，張放已經將近六十歲。從60歲直到他晚年的書寫，大量集中在寫1949來臺外省人的身分敘事，體現他們一代人的喜怒哀樂，這是張放晚年寫作最突出的題材、也是作者本身念茲在茲的主題。

從20歲寫到80歲，早年張放有許多得獎紀錄，晚年寫作卻相當孤獨。應鳳凰〈書話張放〉一文描述張放，「無論讀者與同行如何冷淡以待」，也「不自卑不放棄」的寫作堅持到底，⁵就這角度來看作家張放，實是「臺灣文壇一位奇人」。她提到考察張放前20年作品，多在非主流出版社出版；2004年之後小說相對寫的少，雜文多，除少數幾本從公家出版機構出版外，大多數自費出版。雖未言明，但暗指同行或讀者對其創作的冷淡，表現了作家的寂寞之處。不過綜觀〈張放先生著作書目〉，其小說作品創作量於2004年之後一樣非常多。此出版狀況更呼應了應鳳凰所說，七十多歲八十歲的文人，不論有沒有人叫好鼓掌，直到最後一刻除了創作還是創作，怎

澎湖事件中成為職業軍人。

³ 根據2003與2005年分別收錄於《水長流》和《放齋書話》附錄的〈張放文學創作年表〉，都列張放第一本出版的小說集為長篇小說《奔流》（1954）。《新地文學》編輯室編：〈張放先生著作書目〉，《新地文學》第24期（2013年6月），頁293-296。雖為張放逝世後首度所作書目最為詳盡者，不過其第一本小說著作是列1958年的中篇小說《野火》，和〈張放文學創作年表〉有別，可見張放的著作書目還需要更詳盡的校訂。

⁴ 張放：《豔陽天》（臺北：秀威資訊，2013年）；張放：《台北茶館》（臺北：秀威資訊，2013年）。

⁵ 應鳳凰：〈書話張放〉，《新地文學》第24期（2013年6月），頁272-279。

麼能不說是臺灣文壇一位奇人？而我們若自創傷心理的需求來理解，將不難體會他為何要持續的寫，以下則就三個部分來論及其心理創傷的來源。

（一）白色恐怖中的冤案、假案與錯案

1945年5月，臺灣實施戒嚴統治。1949年下半年，國民黨退守臺灣。1947年7月13日，39師師長韓鳳儀將流亡至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強行編入軍隊，煙臺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不服，為爭取學生權利而引發衝突。之後張敏之校長以及鄒鑑校長與其他5名學生劉永祥、譚茂基、明同樂、張世能、王光耀以「匪諜」罪名在臺北馬場町槍決，而此一冤案的牽連者眾多，多達百人。⁶

1950-1987年這段白色恐怖期間，臺灣共出現兩萬九千多件的政治案件，有十四萬人受難，3000-4000人遭到處決。⁷這樁冤案事件，乃是長達四十餘年的戒嚴白色恐怖中眾多冤、假、錯案之一，株連者雖多，但澎湖七一三事件（又稱澎湖事件）在臺灣戰後歷史的能見度卻低。郝譽翔具自傳性質的小說《逆旅》中提及曾經歷此一事件的父親，在1999年拿到《山東流亡學校史》一書時的激動：「這是我的歷史啊，居然如今我才知道。」⁸而在過去數十年來，當郝父反覆對人述說這段歷史時，對方總是難以理解的當作談資罷了。這段情節，儘管出自於小說，但是仍勾畫出這段歷史的不被認識，乃至於當事者也對此一相隔久遠又人證難尋的昔日往事產生是否真實經歷的虛幻感。在現實生活中，曾在2014年參與臺北市長選舉候選的78歲趙衍慶即為山東流亡學生。他曾就讀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4年，但在一次訪談中卻表示不知道七一三事件，甚還以為張敏之校長安享晚年，⁹可見澎湖事件在公領域上被遺漏的程度。

⁶ 張放《大海作證》中敘述：「當時的國防部次長，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和教育部長程天放像當時東南行政長官陳誠申請，把這8000名山東青年送往澎湖，年滿16歲男生照軍隊編組，上午實施軍事教育，下午繼續讀書。當時我們聽了非常高興。誰想到這都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政治騙局呢？」、「煙臺聯合中學的張敏之校長不服，為8000名山東青年請命，提出交涉。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39師師長韓鳳儀，找了一批特務爪牙，製造冤獄，將張敏之等師生一百多人拘捕入獄。最後透過臺北保安司令部，迫使七位煙臺聯合中學的師生俯首認罪。」此為張放對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案（即澎湖事件）的大略敘述。張放：《大海作證》（臺北：獨家出版社，1997年），頁3-6。

⁷ 李筱峰：〈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類型〉，參見：<http://www.jimlee.idv.tw>，瀏覽日期：2005年10月4日。

⁸ 郝譽翔：《逆旅》（臺北：聯合文學，2006年），頁79。

⁹ 陶曉嫻：〈穿越臺灣近代史的老兵趙衍慶〉，參見：<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張放也經歷了澎湖事件，在他的散文〈海是來時路〉中曾紀錄張放尚未來臺前與張敏之校長的互動。¹⁰他曾說道：「我是隨山東煙臺聯合中學來的，我親身目睹的這段血淚的史實，如果不將它寫出來，我是死不瞑目的。」¹¹張敏之、鄒鑑以匪諜名義被槍決，慘死於自己同志之手，他說：「這是永遠讓我們難以服氣的事，只要這件冤案錯案假案一日不公開平反，我們一日不能心安……」¹²這或許是張放創作的動力之一。早在 1979 年張放即曾計畫以山東流亡學生作為背景，寫一部自傳體小說。因題材敏感，妻子淚訴：「你寫這種東西作什麼？你想給兒女留下禍根，讓他們受到政治干擾麼？」¹³張放思前想後，默聲啜泣，也感嘆中國人對待政治異己自相殘殺的殘忍。

王鼎鈞在《文學江湖》的〈匪諜是怎樣做成的〉一文中提到：

（按：澎湖事件）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¹⁴

article/new/20141121/510676/2014 年 11 月 21 日，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27 日。

¹⁰ 〈海是來時路〉：「早在 1943 年張敏之任山東臨時中學校長時，我便是他的學生。雖然他不認識我，但對我的名字印象極深。……為了向學校請長假，我寫了一只情文並茂的請假單，最後呈到張敏之的校長手中。……他像一隻暖水壺，外貌冷若冰霜，內心卻非常溫暖。他看了我的長假單，用毛筆批了一行字。雖過了半個多世紀，但我依然能夠背誦而出：准病假，癒後返校。送高粱麵 50 斤作路費。」見張放：《大海作證》，頁 8-9。

¹¹ 張放：〈漏船載酒泛中流——寫長篇小說《天譴》的隨想〉，《文訊》第 165 期（1999 年 7 月），頁 74。

¹² 同上註。

¹³ 同上註，頁 75。

¹⁴ 王鼎鈞：《文學江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9 年），頁 32。1994 年張放赴美，哈佛大學考古人類學者張光直便已鼓勵張放寫出澎湖的白色恐怖事件，為歷史留下紀錄；而張放以此山東流亡學生冤獄案為創作背景的作品《天譴》則到 1998 年才創作發表。筆者所指導的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專班的張文竹同學認為，立委高惠宇、葛雨琴、謝聰敏提出澎湖事件平反案為 1998 年，該年《天譴》亦發表，此代表著政治威權的鬆綁，可使張放創作發表較無後顧之憂。筆者大致贊同此一說法，不敢掠美，特此紀錄。平反案的提出與《天譴》的發表雖無法具體肯定其間的直接關係，然這的確代表著政治風向的

我們無法確認王鼎鈞這段話中所說的小說家是否為張放，但可確定的是，這是具有道德良知的知識分子在受到白色恐怖壓迫下的共同心理。張放在解嚴之後噙著熱淚寫下一系列的邊緣人小說，¹⁵小說中重複相同或者類似的白色恐怖，其原因便來自於這種倖存者的罪惡感。張放自己曾經背上匪諜罪名，挨過扁擔、受過電刑，但最終逃過一劫；然而張敏之校長、以及那些無聲失蹤、投海的同學等等卻不清不白的失去了生命。活下來的人無法為喪失生命的人說話、不論是「死不瞑目」或是「無恥」，都是懷有強烈的歉疚以及負罪感，張放寫作不輟，可由此一視角來思考。¹⁶

（二）思想控制與知識分子的恐懼

在長達近四十年的白色恐怖這段時間裡面，由於戒嚴法與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限制使得兩岸隔絕。除了法令限制之外，尚有龐大的特務系統的監控，滲透到各行各業之中。

解嚴之後再執筆，對於張放的意義不同以往。他自言，終於可以說真話。其作《天河》的自序中便說道：

寧願被讀者咒罵，也要寫出真心話，實在話，絕不討好媚俗，博取讀者的廉價同情。七十開外的老芋仔，也不奢望當個什麼理事、委員了。唱了大半輩子喜歌，做了四十多年抬轎伕，如今也應該醒悟了。¹⁷

作家這番真誠的「自白」，和一般民眾長期以來對於第一代外省人的刻板印象是不同的。解嚴之後外省族群在身分敘事上面臨衝擊與矛盾，落入無所

改變和接受程度，有助於揭露與寫作白色恐怖期間的冤案與歷史。

¹⁵ 「邊緣人三部曲」為《海魂：邊緣人三部曲之一》、《漲潮時：邊緣人三部曲之二》、《與海有約：邊緣人三部曲之三》，皆由臺北昭明出版社出版。

¹⁶ 張放為1949年來臺的外省人群體中的一員，同時也是澎湖七一三事件中的政治受難者。他的長篇小說《天譴》和《春潮》都是以捲入澎湖案的山東流亡學生為主角的寫作，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傳色彩。他在《天譴》的自序中即明言寫作內容是「我所親身經歷的澎湖流亡學校師生冤案」、《春潮》則是「寫出澎湖白色恐怖的史實，以及我親身目睹的悲劇人物」，都說明了張放在小說中以自身經歷書寫歷史的企圖。關於「山東流亡學生冤案」與張放對澎湖七一三事件的寫作探討，可參看張文竹：〈張放與澎湖案〉，收於張文竹：《張放小說中的澎湖書寫》（臺北：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9年），第3章，頁31-64。

¹⁷ 張放：《天河》（新北：詩藝文出版社，2007年），頁8。

依傍的徬徨之中；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卻也在這段自白中閱讀到第一代外省作家「做自己」、找回主體性的正向性可能。

張放曾在《海魂》中以自己的朋友 C 為藍本表現了 49 年來臺知識分子的悲哀。¹⁸山東蓬萊籍 C 和張放一起在澎湖，他是業餘話劇演員，曾向張放懊悔跑來荒島，像蘇武牧羊，有家歸不得。C 後來竟患了失語症，原因竟是「假裝啞巴」，因為「他想離開澎湖，脫掉二尺半！」C 其後在野戰醫院潛逃，軍方不知去向，但張放聽到高雄民營廣播電臺，知道他當了播音員。脫下了軍服，C 又從「啞巴」變成了廣播員，不正說明了體制的荒謬？

何以要採取「裝啞巴」如此極端的手段呢？《海魂》中以罹患失語症的人物任助來陳述，他和當時因共諜案被調查的蕭熙是同學，因此受到監控的行動限制。任助認識的蕭熙是忠貞的國民黨員，蕭熙案自然為冤案。任助因此心中憤憤不平，加上思鄉情切、行動受限，故成為逃兵冒充失語，演員變啞巴。

張放的小說中屢屢可見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軍中情治單位時時注意「可疑」以及「不可疑」的人物。知識分子們對現實無力於是裝聾作啞，更有甚者，為隱藏自己混世生活。《海燕》敘述人物何為霖：「對於白色恐怖策略非常瞭解，欲是埋首書房，努力勤奮的人，欲是惹人懷疑，注意。早期大陸來臺的知識分子遭受政治冤獄，多半是這種人。凡是遊手好閒，狂嫖爛賭，昏天黑地混日子的，絕對安全可靠。」¹⁹失語、裝瘋賣傻、莫談是非才是硬道理，對知識分子是何等諷刺。

張放的小說裡只要是熱愛文藝的，在軍中便是倍受懷疑的對象。判斷誰是匪諜的時候並不具理性，喜好文藝的閱讀者便在情治人員監察之列。國民黨在遷臺後檢討丟失大陸的原因，認為和文藝工作的失敗有很大的關係，因此在戒嚴時期著手加強文化思想的控制。《海魂》中的安全室主任語帶威脅向主角于光說：「抗日時期，我的大學同學不少跑去了延安，他們也像你倆一樣愛藝術，會演戲，愛文學。不過，你們要提高警覺喲。」（《海魂》，頁 27）表現的便是國民黨政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與不安心理。對於左翼文藝作品稍有認識者，便成為被注意的目標——儘管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究竟是如何抵觸了反共目標。

¹⁸ 張放：《海魂》（臺北：昭明出版社，2001年）。

¹⁹ 張放：《海燕》（新北：詩藝文出版社，2006年），頁 78-79。

《海燕》中杜誠偷偷摸摸的寫下《海燕》表現反內戰思想，記錄歷史悲劇，並無宣揚共產思想的意圖，杜曾把《海燕》給同事何維霖讀，何一次在牌桌上講出來，引得後來杜誠被押往綠島，最後落得自殺的命運。而使得小說人物感嘆「在沒有民主自由的社會，搞文藝還不如當強盜安全。」（《海魂》，頁 68）

不只杜誠身亡，何維霖也因此內疚陷入長期的痛苦：「在當年白色恐怖的籠罩下，知識分子之間交往，猶如麻桿兒打狼——兩頭兒怕。」（《海燕》，頁 135）且事後何維霖一直在想麻將桌上誰是告密者？「暗自佩服臺灣訓練的情治人員，比希特勒的蓋世太保還高竿兒」（《海燕》，頁 79）——但事實上，重點並非誰是告密者，小說根本性的指出這些牌友對他的活動瞭若指掌，從戶政事務所、電信郵政機構，都可以查到蹤跡，而「這些情況，我們局外人茫然不曉」（《海燕》，頁 80）。張放批判國民黨思想控制的黑暗與嚴密十分明顯，對於知識分子流露強烈的同情之感。《海燕》中直陳：「國民黨根本不了解知識分子的熱情啊！」（《海燕》，頁 182）批判了政權的腐敗，也為知識分子的際遇而痛惜。

（三）兩岸隔絕的心靈傷害

從 1949 年到 1987 年開放探親，國共內戰造成海峽兩岸的隔絕與斷裂，是黑髮至白頭的痛苦等待。所以在探親的血淚故事之外，張放更痛批國共之間的鬥爭，和張放同行代的作家司馬中原也同在小說《最後的反攻》中藉由人物之口說那是場「混仗」、「烏龍仗」，²⁰不知目的何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戒嚴時期，國共內戰被塑造為一場正義的戰爭、是漢賊不兩立的道德聖戰，反攻大陸是為了拯救處於水深火熱的同胞。然而，解嚴之後，他們開始重新評價歷史。張放將這一段歷史詮釋為是師出無名的戰鬥，他的「邊緣人三部曲」之一《海魂》的序中道：「通過於光的愛情生活，我對五〇年代海峽兩岸的政治領導人，進行溫和的批評與歷史評價：也許你倆為了千秋事業做出貢獻，但你倆卻沒有照顧同情可憐我們這一百萬因內戰渡海來臺的知識分子、商人、教師、公務員和軍人！讓我們站在海岸眺望滾滾蕩蕩臺灣海峽的海浪，流了四十多年相思淚。」（《海魂》，頁 13）「沒有照顧、

²⁰ 司馬中原：《最後的反攻》（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2009 年）。

同情與可憐」這樣的自白，因來臺外省族群中的階級差異所可能產生的差別對待，論述上還有待爭議；但是，重點在於此番言論的後半段所言——臺海嚴厲隔絕「四十年的相思淚卻無可償」卻正是第一代來臺外省人的共同寫照。

張放《天河》中藉由人物之口感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八年，人民還可以通信，但是國共內戰幾十年海峽兩岸不准通信來往，這是他媽的什麼政策？這不是迫害老百姓是什麼！」（《天河》，頁 84）所以張放小說屢屢重複他們想要偷渡回鄉的情節，如《山妻》的〈病中月〉秦鵬為返回福州家鄉，自澎湖偷渡出海、²¹《水長流》的〈榕樹下〉宮寡婦大罵蔣、毛不讓通信，也想偷渡回福建、〈酒逢知己〉馮立達偷渡回大陸見母親、²²或者是想盡辦法藉由第三地回大陸的《海魂》任勛等等，張放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皆為軍人或軍眷，接受敵我之辨、反共教育訓練的第一線士兵尚且如此，更遑論一般民眾。

親人、愛人與朋友等等，因為身陷「敵營」都不可連繫，為了突破兩岸隔絕的禁制，他們不計一切的偷渡，存錢請漁民渡船去閩江口上岸。海峽隔絕所帶來的情感痛苦，這些情節在解嚴之前的外省小說家筆下早有沉痛地呈現，五〇年代就被書寫的懷鄉主題，隨著時間流逝益發凸顯它的矛盾：懷鄉的投射之處，卻也是漢賊不兩立的敵營。懷鄉的沉與痛早見於柏楊《掙扎》、即便是最為溫柔敦厚的琦君也曾寫出如〈鐘〉般無可排遣的懷鄉之苦的小說，主角飽嚙疾病、貧窮、孤獨、衰老，最後在得知老妻死亡後自殺。²³

解嚴後張放在作品中則直指造成懷鄉痛苦的源頭所在——罔顧人民的統治者蔣介石與毛澤東。我們懷疑如此直接作歷史的批評而放棄了隱喻與暗示的寫作手法，是否降低了其作在文學美學上的價值；然而，張放直爽的個性卻不待言。我們未曾在外省作家的小說中見到如此直接的指控，解嚴前張放的小說也幾無碰觸此議題，但在邁入九〇年代後，走向 60 歲的張放便直言不諱作歷史性的控訴。他未曾將此歸因於命運、理想之類或是玄虛、超然的觀點，不過這並不代表他沒有信念，而是他對務實的人間生活，尤其是普遍大眾的生命情境更為關注與熱愛，他代表的不只於他自己，還在於他們這一代人生命的詮釋，這一方面的課題我們將在後面再行探討。

²¹ 張放：《山妻》（臺北：巨龍文化公司，1993 年）。

²² 張放：《水長流》（新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3 年）。

²³ 琦君：〈鐘〉，收於琦君：《菁姐》（臺北：爾雅出版社，2004 年），頁 253-274。

三、歷史失憶的恐懼與歷史的使命感

第一代外省人在探親開放與解嚴之後開始清楚覺知、或開始在文字中呈露國共內戰、白色恐怖與兩岸隔絕所帶來的惡性結果。張放小說的敘事動力除來自於心理創傷之外，更進一步思索走入解嚴之後他們這一代人在他人的記憶中如何被認識與記憶。以下分別就兩個面向來論述張放對於1949來臺外省人在歷史中如何被記憶的隱憂：

（一）難以被了解的離散遷臺者

張放很清楚時間的意義；《天河》中便曾敘述離開戰爭的年代愈遠，人民的災難印象愈加模糊，何況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過著緊張忙碌的生活，人們對這一百多萬隨著戰敗撤退來臺的人，缺乏了解與同情（《天河》，頁92）。第一代外省人的經歷，從饑荒戰爭到流亡臺灣，自懷鄉到白色恐怖陰影，國共內戰的刻骨經驗未必能夠言說讓人充分理解，本質上是虛空而落寞的，因此陷入無言的痛苦中。

而且無法使人充分理解的生命情狀，恐怕是連他們下一代能予以了解體會都是困難的。父老子幼的世代差距，或是原因之一。由於1949年初來臺灣的外省人懷抱著返鄉的希望，沒有預期會長期的居留臺灣；也可能因為他們有情人、妻子留居家鄉，初期他們並未考量結婚的需求。而希望能成家者，也有現實問題的考量。當時軍人待遇低，積蓄有限，且在當地人眼中的「外省人」，不是讓當地人信任的結婚對象，所以待到結婚之時，年紀上已經較當時一般結婚年齡來的長。上下兩代生命經驗迥異，下一代因為兩岸隔絕對於山河故鄉難以了解外，生活中相異的文化情調與感覺結構，也使得他們無法真正進入上一代長期創傷的心理內核。這並非只是無法溝通的問題而已，而是在於創傷的不能理解。

尤其來臺外省人的離散具有歷史特殊性，他們的懷鄉除欲返而不能回外，尚且斷絕一切訊息，長期生活在「反攻復國」的虛言之中，因此小說家筆下的人物最後常常瘋狂或是瀕於崩潰。他們所面臨的是理性所不能解釋的情境，故張放在《春潮》的〈後記〉中便寫：

三四十年的離鄉背井，用「鄉愁」兩字能夠概括了麼？這豈不是「瞞和騙」的鬼話！……是的，我們懷念故鄉，但懷鄉之情矛盾而複雜。……韋莊寫出「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的詞句，他

們懂；但是海峽對峙四十載，互不通信、斷絕往來，這種反人道主義的決策，帶給我們心靈的創痛，像長出一顆惡性腫瘤，永遠無法切除或治療。海峽對岸「臺灣文學評論家」是永遠摸不清、感受不到的創傷。²⁴

外省人的「懷鄉」不只是在於想念故鄉的當下處境，海峽隔絕四十載之後，雙親已逝、情人已老，內心的遺憾和負疚無法彌補。原來的認識重新洗刷，就算還能再相逢，兩岸造成的情感、經歷、生活習慣與思想差異的落差與距離，卻再難用餘生彌補和連接。張放《情繫江家峪》中收錄兩篇「探親小說」：〈情繫江家峪〉與〈淚灑相思地〉。〈情繫江家峪〉于成龍和左傾的哥哥于成聖少年時感情融洽，成龍對哥哥的熱情、博學和領袖氣質充滿仰慕之情。40年後再返鄉，老父已死，自己也因為隨國民黨到臺灣，使得家族「成分」不佳，使得哥哥與侄子升遷受阻。經歷文革與官途受挫，成聖個性大變，弟弟成龍拿來的饋贈的墨鏡，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相思40年，但成龍回鄉就與成聖吵架，住了6天便不告而別。〈淚灑相思地〉江源隱瞞自己在臺重婚身分返鄉，再見結髮妻子于小英，小英刻苦生活，守節未嫁，但心繫妻女孫兒和臺灣生活的他，情感上拋不開臺灣家庭，又對髮妻有思念、有責任，兩難的拉扯使得江源既疲倦又愧疚。²⁵

難以兩全的此與彼，最後的隔絕悲劇變成難以跨越的「天河」，這不是「返鄉探親」所能解決。〈情繫江家峪〉中的哥哥雖然吝嗇苛刻，但張放不是把探親的重點放在金錢關係，他畢竟沒有把大陸親友塑造成見錢眼開的吸血蟲，他更著眼於時間差距所引申而來無可跨越的距離。

張放的筆力粗曠，在情節上往往是大塊的揮灑塗抹，甚至忽略結構的完整性，但是在兩岸隔絕所引申的差距問題中的情感細節沒有放過，《天河》中一樣有類似情節，老兵李彥得以返鄉再見髮妻、兒子，但卻無法長久定居煙臺。他想念髮妻，但也受不了內心的沉痛、傷感和痛苦；長久的兩岸隔絕，他和臺灣的妻子情感與生活都相互依賴，無法割捨。李彥拒絕再返

²⁴ 張放：《春潮》（新北：詩藝文出版社，2008年），頁254-256。

²⁵ 張放：《情繫江家峪》（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

大陸定居，如同髮妻菊花拒絕來臺，兩岸情最後的結果停留在朋友對李彥的勸告：

長痛不如短痛，你去電信局把電話號碼更換，以後就別再扯那些牛郎織女的遊戲了。記住，李彥，牛郎織女相會不是真事，它是神話。（《天河》，頁 178）

時空的隔絕，能夠再見親人雖然已屬難能可貴，但是錯失長期共同生活基礎，日久人變、價值觀產生差異，缺乏往來的結果，難以再拾起數十年的差距，除了張放，幾乎沒有作家直面這樣的現實。

張放更進一步的論及兩岸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形成不同的價值認識。《天河》寫李彥數 10 年後再和留在大陸的妻兒聯繫，匯錢過去卻遭到「反對資本主義的痛斥」，李彥在感嘆之中便不無隱喻的指出：「兩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風俗習慣不同，也許咱們的好心，他們卻視為歹意。海峽兩岸分裂數十載，若想統一，那大抵不單是民族感情的問題吧？」（《天河》，頁 123）即便是想盡了 40 年的親人，再相見時依舊難以跨越時間的天河，殘酷的面臨難以溝通、無法被理解的現實。張放曾在九〇年代小說《與山有約》中提及對民族共同情感的重視，²⁶但是也並不將民族情感認為是萬事可解的萬靈丹；透過小說張放傳達出國家最應該重視的還是在於人民本身，這也是他在多部小說重複提起不認同發動國共內戰的兩位領導人的原因。

作為 1949 來臺外省人群體中的一員，張放此一想法所流露的意識形態並不討喜。筆者當然不認為第一代外省人都是想法一致的群體，毫無差異性，不過他們與國民黨政權之間普遍的具有複雜的依存關係。為了在臺灣生存，他們對於國民黨政府雖頗多怨言，可同時和政權的存附關係也不得不然。這除了在於來臺外省人服務於黨國機關者眾多之外，還在於這也是帶著他們來臺、長期以來唯一可以依賴照顧，並且承諾返鄉的政權。張放的小說《寒流過境》的〈壽宴〉即提到張楠因為看羅曼·羅蘭小說被誣為政治立場有誤，但即使在多年退伍後，還是去參加了昔日師長的壽宴，

²⁶ 張放：《與山有約》（臺北：獨家出版社，1997 年）。

因為「50 師是我的親娘，離開了娘，我去臺灣舉目無親，誰會照料我的生活？」²⁷

張放的小說常常出現主角因為熱愛文藝或是國共內戰中被俘虜而在軍中因此成分不佳，無法升遷或是終身受到祕密調查的情節，這無疑是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可偏偏主角在軍中所受到的照護與同袍之間的情誼，卻也讓主角難以脫離對於軍隊的情感束縛。軍隊作為國家機器的一環，無疑不可能將軍隊與黨國一體的政權分而觀之，這種愛恨雜揉的情感，不僅外界難以理解，他們自己也很難面對。張放是唯一一位會直率地批判政策錯誤，乃至於直言決策者的殘酷與揭露其後的歷史性後果的第一代外省小說家；自張放作品觀之，我們一方面更體會了來臺外省人命運的沉鬱頓挫與孤獨感傷，但另一方面也因此突顯了張放的孤鳥性格，與注定成為難以被了解的孤獨者命運。

（二）歷史性的邊緣化

張放對於國民黨政權給予知識分子的思想壓迫滿是憤慨、痛恨乃至於怨恨國民黨官僚；可是相對的，張放也不信任共產黨。早在解嚴前他得到國軍文藝獎榮譽的長篇小說《遠天的風沙》中，便描述抗日戰爭期間共黨兩面滑溜的發展手段，對其批判。²⁸

張放藉由主角表現不認同共黨手法，表面看來這部小說彷彿代表「反共」的政治正確，不同的是小說在人物塑造上並非反共小說常見的善惡兩分法；張放所寫初期為中共所效力的知識分子中，仍有品格高尚、貫徹始終者，為了黨國，九死猶未悔。只是這樣的人物，在小說中一樣不得善終。

到了解嚴之後，張放沒有改變他對於共黨政權的失望看法，且持續的寫出像是《春水桃林》中的〈鴨子〉。主角的弟弟鴨子，原是充滿浪漫主義的文藝青年，後因海峽兩隔分開多年失了音訊，原以為凶多吉少，但 38 年後自海外收到了鴨子的信。鴨子信中寫著自己在反右運動中犯了錯誤，到大青山麓進行勞改，30 年來丟下了筆，連報紙也不看，反右運動使他對於文化、政治又恨又怕乃至於心死，「活著已嚐不出海鹹河淡、生離死別的滋

²⁷ 張放：《寒流過境》（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 年），頁 187。

²⁸ 張放：《遠天的風沙》（臺北：黎明文化，1982 年）。

味」。於是，第一封信也成了最後一封信，鴨子不願再和兄長聯絡。不論是國民黨政權下的知識分子，還是共產黨政權下的知識分子，在張放的筆下都遭受了極大的挫傷，張放同情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而自己更是其中的一分子。²⁹張放筆下的知識分子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不論他們所效力的是哪一政黨，都是懷抱著熱愛國家民族的信念奮鬥，而黨國對待他們的卻是流放、離散甚至是拘禁、死亡。

同時，張放也在《春潮》也表示了對於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一語的觀感和批判。他認為這是毛澤東對國民黨軍人缺乏同情的理解，這些毛澤東眼下的「流寇」，也是懷抱著滿腔愛國熱血，犧牲奮鬥，希望把祖國建設成富強樂的國家。毛澤東卻只將他們放在成王敗寇的敵／我架構中理解，張放因此說出受辱者的心理：「既然毛主席稱他們是流寇，地老天荒，海枯石爛，他們也不會再和你握手，更別說俯首稱臣了！」（《春潮》，頁147-148）這種價值與尊嚴的抹殺，可能引來消極的抵抗，而無益於民族發展，此一發言可視為對當權者的國族諍言。

共產黨如此，國民黨亦不可信賴。張放小說中的人物在不同地方重複著「你愛國家，國家不愛你」的吶喊。諸如〈明月〉老于痛苦吶喊：「我千辛萬苦跑出來，追隨政府……可是咱的國並不稀罕我這種人啊！」（《水長流》，頁167）《海魂》西門慶：「你愛國家，國家不見得愛你。」（《海魂》，頁167）同樣的話又見《與山有約》黃鐵嘴：「我愛這個政府啊，可是政府並不疼惜我啊！」（《與山有約》，頁216）或者是〈走出白雲山〉的孟國忍「我把中華民國當作親娘……可她從來不疼我」（《山妻》，頁16）等等。如前所述，來臺外省人對於政府的照顧固然心懷感激，但是實際上前述政權所造成的傷害也難以彌補，張放在小說中重複抒情，彷彿不如此反覆不足以表達傷痛。

張放筆下的人物，對國民黨政權充滿了沉痛且糾葛的情感。《與山有約》中的主角杜小甫，17歲遭到抓兵，離開故鄉，理應他該憎恨當初將他抓兵來臺的段喚，不過來臺後段喚在軍隊中誠摯對待杜小甫，反使得杜小甫心存感激。段喚死去多年，杜小甫仍一心想在公園中修築段喚半身銅像紀念他。而《與山有約》的情治人員歐陽身和軍人朱之道尤其尷尬；朱之道因為私藏普希金與魯迅兩冊書，被押解綠島關了3年，特務打斷7根扁擔沒

²⁹ 張放：《春水桃林》（臺北：中央日報社，1989年）。

死的朱，一夜被喚醒後受山東同鄉歐陽身逼供，竟然因聽到鄉音嚎啕大哭，簽了「自新書」。朱之道日後再見歐陽身，感恩歐陽的照顧，讓他活下來；另一方面，歐陽身對共諜案的枉屈心知肚明，「所謂照顧山東同鄉，是沒有用扁擔把朱之道打成殘廢」（《與山有約》，頁 225-226）。

該愛無法愛，該恨不能恨，是張放筆下來臺外省人對國民黨政權矛盾的情感寫照。《水長流》中的〈守門人〉中的晁仁即是一個這樣的例子，他曾發言誇獎共軍而身陷囹圄，從此不關心國事。退伍後，晁仁雖不受黨部同鄉影響，投票時還是會投給國民黨員或無黨無派的候選人，從不投給反對黨民進黨。解嚴前受到白色恐怖迫害，解嚴後又無法託付反對黨，張放並未於文中明白剖析其心理，卻指出了第一代外省人的情感取向。

來臺外省人與政權難捨難分的矛盾，使得他們彷彿處於歷史的隙縫之中。《與山有約》的朱之道被刑求、押解 3 年後，被分派沿海小島當反共救國軍，陰濕的碉堡磨難身體，之後又寒儉退伍。折磨大半生涯，他以文藝創作當作自我救贖，謹記普希金之語：「任何權勢、任何統治也禁不住印刷的砲彈摧毀一切力量」（《與山有約》，頁 235），耗費心力寫下記錄四〇年代末期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小說，最後落得無法出版的窘境。解嚴前的臺灣因為政治不正確無法出版，解嚴後期待在中國出版，又受到退稿。退稿信件是：

你在長篇小說中所寫的白色恐怖事件，雖非虛構，但已成過眼雲煙。在當前改革大潮中，這種題材小說毫無通路。謹將大作壁還。並請你擦乾眼淚向前看，為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與山有約》，頁 237-238）

朱之道因此氣得精神崩潰而瘋狂。表面上是全心付出的文學創作無人重視，實則是朱之道最後一道救贖的防線崩毀。如果苦難成就文學，文學有超越政權者的力量，那麼沒有讀者的作品又如何產生力量？朱之道一生信仰因此無可託付。在另一層次上，也可看出張放將文學創作的出版問題簡化，突出的不僅在於朱之道作品不合時宜，更在於他們這一批受白色恐怖之禍的來臺外省人的不合時宜，兩岸都不被了解的邊緣化處境。不論是「改革大潮」還是「祖國統一大業」，這種充滿民族主義式的官僚語言，一樣忽略他們的命運，僅把他們當作過眼雲煙般輕輕掠過，是不必要正視的歷史；或說是無法被納入當時中國民族重建的敘事之中。

四、「老芋仔」的故事：³⁰外省人如何邁向未來？

作為走過澎湖事件的一員，若張放解嚴後撰寫的小說意圖僅是翻案式的為澎湖事件中的受害者代言，那麼他在其自傳性質的小說《天譴》裡即可說出並凸顯他們共同的遭遇。可是不論是《天譴》、《海魂》或是《春潮》，即使是以澎湖為背景，不過卻不一定是對於山東流亡學生的匪諜組織冤案做鉅細靡遺的描寫。也就是說，張放如此的寫法並非是聚焦特定歷史事件的小說寫法，使得對事件本身歷史性的控訴力道減弱許多。筆者認為他對於龐大 1949 年前後來臺外省人敘事的重視，更甚於把對冤案始末作歷史控訴。特別是自上面的論述我們得知，不論是在創傷來源的內在敘事動力，還是面臨外在世界邊緣化、不被理解處境的擠壓揭露，他在解嚴之後的小說敘事，都試圖展現了身為遷臺離散老兵群體的思索與矛盾、創傷和尊嚴，而此對於張放的價值和意義更甚於澎湖事件的再現。

張放不間斷的寫作，然無可諱言的，他的小說具有高度的重複性。³¹比張放更年長的作家裡面，同樣有一位高度重複自己創作的作家——琦君。琦君的小說中，往往高度重複幾個常見的人物、情節以及主題，藉由此在

³⁰ 「老芋仔」一般是臺灣本地人對於 1949 隨國民政府來臺外省兵的稱呼。「芋仔」和「番薯」相對，番薯是指本地臺灣人，芋仔就是「外省人」，在語氣上有歧視的貶抑之意。胡台麗在〈芋仔與番薯——臺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一文，曾說明開始使用「芋仔」此一稱呼時，臺灣兵沒有輕視外省兵之意，而後來「退伍進入社會謀生的低階外省士官兵大多停留在臺灣社會的底層，本省兵最初使用『老芋仔』這個稱謂時即使沒有看輕的意思，卻因為不少低階退役外省老兵社會地位低微，無形中給『老芋仔』這名稱附上社會評價」。見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 年），頁 284。張放解嚴後的小說中常稱呼第一代外省人為「老芋仔」，尤其是他們的「本省」妻子。此一「老芋仔」身分，在張放的小說中沒有貶抑只有自豪。如張放小說〈水長流〉中的人物白果，蛙人退伍，善泳，娶小他 14 歲的臺灣本地人為妻，夫妻感情和睦。一直到近八十歲，他還會對崇山峻嶺吼叫「口令」：「立正稍息向右看齊」，一派軍人作風。晚年仍精神奕奕地以熱愛民眾的精神參加山難救助隊，九二一大地震時亦參與救難貢獻心力，死後骨灰灑於南投荖濃溪。一般民眾對於「老芋仔」此一稱呼所代表的貶意在此反而成為一種親切的調侃，代表他們從軍以來的獨特經歷，而此一經歷則形成他們雄邁熱情的精神特質。

³¹ 張放小說人物塑造的重複情形高；在情節結構安排方面，脈絡亦不甚明晰。尤其 2010 年之後的作品，情節更顯雜蕪。晚年長篇小說中往往出現眾多人物，使得支線龐雜、主從不清。筆者認為他重視人物呈現的集體性意義更甚於單一人物，甚至是情節經營，如此自然也影響了作品的文學表現。

心靈上不斷的重返家園、合乎傳統倫理道德以展顯崇高理想，安頓離散者漂泊的心靈。而張放的重複敘事，對於他本身而言，則有著自我敘事重構、寄託理想的意義。張放之女張雪嫫曾經敘述張放小說的重複之處：³²

他青年時代就愛寫的小說，也多半以自己那麼一個 1949 年隨國民黨來到臺灣的流亡學生為主人公。這個人，早年有肺病……後來，他的世界有了一個美麗的黑蝴蝶，健康、熱情、沒有太高學歷，最好是原住民，而男主角就和這麼一個性感的年輕女子大談戀愛，結婚生子。相伴的是幾個朋友，不是共同開茶館，就是經營果園，或是辦學校，喜孜孜的忙得不亦樂乎。無論小說還是散文，爸的筆下，是一個勞動人民化了的他自己。他愛勞動人民，甚至把他們理想化了。必須是樸實、健康、率性，為愛不顧一切，才可以是他故事中的主角。³³

張放晚年創作的文類包含散文、評論、小說，其中以小說的創作數量最大。張放對小說心心念念，晚年傾全力創作小說，張放重複寫作的小說人物並非真實的他。1950 年張放進入政治作戰學校影劇系，畢業之後分發到海軍「海訊月報」，歷記者、副社長，1973 年退伍。六〇年代曾出任「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導，也曾任中央廣播電臺編撰，又任文建會研究委員。1991 年任菲律賓民答那峨中華中學校長 4 年，並同時完成雅典耀大學藝術碩士學位。返臺後任「獨家出版社」顧問、總編輯。從經歷看來，張放絕非他筆下那些老兵與勞動人民。

尤其自女兒的描述，張放晚年長時間照顧行動不便的病妻，小說中與「黑蝴蝶」的情感生活卻十分激情熱烈；³⁴他在書齋中長時間的耕耘小說，

³² 張雪嫫為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與文學系博士，專長為中國現代文學史與女性文學，現任教於世新大學中文系。有張雪嫫：《當代華文女作家論》（臺北：秀威資訊，2013 年）、《天地之女——二十世紀華文女作家心靈圖像》（臺北：正中書局，2005 年）、《唐傳奇中的「異人傳」》（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 年）等著作。

³³ 張雪嫫以〈不斷寫作的人〉一文紀念父親張放，也以此標誌自己的父親戮力寫作的精神。其悼念父親的文章既有女兒的孺慕深情，又融有專業學術眼光所做的判斷，見張雪嫫：〈不斷寫作的人——記我的爸爸張放〉，《新地文學》第 24 期（2013 年 6 月），頁 290。

³⁴ 黑蝴蝶為張放小說〈黑蝴蝶〉的女主角，是一名原住民身分的女護士。形象健美、輕快、多情，是張放小說中女主角的原型。從張放散文〈大海作證〉和〈海是來時路〉看來，其妻青春時正也是一名多情的護士，如同張放現實世界中的「黑蝴蝶」。此兩篇散文皆收

可是小說中的老年人，開茶館、果園、出版社，生活飽滿有活力，張放可說是躲在與真實相左的創作天堂裡，小說的虛構，正提供了張放暫時脫離現實的管道，自其中得到精神的昇華以及補償。

當然張放的作品不只安頓了他在現實生活中的困局，晚年寫作的他，面對國共內戰的傷害與兩岸隔絕的沉痛，可說是以那些「老芋仔」——底層老兵來重建其敘事。張放在面臨歷史創傷與邊緣化時，選擇了一種「形象」來代表自己的內在精神。如上兩節所述，張放呈現了來臺外省人身份的悲情之處；然觀察張放解嚴後的小說，我們可發現他並不認為要以此來尋求建立外省人邁向未來的形象。我們或許可從敘事治療的方式中來找到一種關於「替代故事」的說法來理解此一問題。³⁵

「替代故事」是治療師替前來諮商者確定的、想要依其生活的故事。治療師想要在對話中尋找、創造自我認同的故事，以協助人從問題的影響之中脫身而出，創造生活的新可能。在新故事中，人會活出新的自我形象，具有新關係的可能性和未來。放在張放的情境來理解，若是創傷已經造成、歷史的無語和邊緣性也已然形成，那麼又該如何尋求未來的可能性？以下便藉由張放解嚴後的長篇小說《與山有約》為代表，分析出兩個以「替代故事」角度理解後值得重視的精神形象：

（一）熱愛臺灣的第一代外省人

張放以臺灣為背景的小說，場景多是臺灣的小城鎮、或是偏鄉，甚至遠至澎湖的小島。九〇年代臺灣文學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於都市生活的書寫；張放小說缺乏大都市的繁華，鄉土才是情感的寄託所在。《與山有約》一書以老兵杜小甫為主角，居住在臺灣西北部的「麻里鎮」。麻里鎮在山海之間，近有麻里灣、後有麻里山，杜小甫就在麻里山灣之間度過他的大半生。

小說中的「麻里鎮」地方描寫本於臺灣西北岸海邊小鎮。杜小甫年輕時曾在麻里山構築防禦工事，30年過去，退伍後他在麻里灣蓋了一間克難平房，住在濱海小屋中，寒流來時在屋內打哆嗦。儘管先天條件不佳，杜小甫熱愛這濱海的小鎮，對它有想望、有期待，不同於一般老兵文學中所

於《大海作證》。

³⁵ [澳]艾莉絲·摩根(Alice Morgan)著，陳阿月譯：《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臺北：心靈工坊，2008年)，頁34-35。

看到的悲苦老兵，對未來只有無奈，杜小甫懷抱願望，充滿活力。他期待女人、戀情、婚姻，滋養他的人生，精彩的愛情故事都在這一地方完成。

張放在小說中熱烈的表達他對臺灣的熱愛，常常有告白式的「愛臺灣」語言出現。以《與山有約》而論，河南住 16 年，臺灣 40 年的杜小甫會直言對臺灣「人親土親」的情感；包括另一人物王師凱，重病時亦仍說：「飲淡水河水……喫濁水溪米……我深愛這塊土地啊。」（《與山有約》，頁 176）張放一直到晚年的作品《豔陽天》寫居於社會底層的外省人開果園、賣水果仍是如此態度。九〇年代張放的態度放在我們一般對第一代外省人的認知中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小說人物的塑造上張放強調外省人在臺灣人親土親與踏實生活的一面，主角杜小甫對於臺灣北部路況的熟悉使他當了計程車司機，因為「從十七歲起穿破了二十多雙黑色膠底鞋，從麻里鎮到礁溪、頭城，沿途的高地、河流，甚至高大的數目和具有史蹟性的碑石、廟宇，即使閉上眼睛也能背誦出來」（《與山有約》，頁 170）。像是杜小甫這樣的退伍老兵，沒有資產、缺乏和上層的社會關係、沒有好的知識水平，小說中的工作不是做小生意賣槓子頭就是打雜勞役工作。社會學家趙剛進行田野調查，眷村中的子弟曾經提到，專修班或士校的職業軍人退伍，最常見的職業是開計程車或擺攤子。特別是開計程車，因為不會福佬話「語言不通」，無法進入如服務業一般的行業，所以從事開計程車，不是非會臺語不可。³⁶然而，小說所呈現的重點不在控訴老兵能謀生的工作有限、或者是語言能力的問題，而是反過來突出杜小甫「優點」，因為他對於生活環境的熟悉，使他選擇了開計程車的工作。

所以藉由開計程車，張放展開了他理想的圖景。載著形形色色的客人，當計程車司機開拓了杜小甫的視野。他從不固執己見，因此懵懂的有了看法和理解，交上肝膽相照朋友；但同時卻也能壓著脾氣站在溝通的角色，和不了解豫劇的年輕客人溝通，使年輕人能接受聽不懂的豫劇。杜小甫是作者理想下塑造的人，杜小甫性格上寬容、誠篤，使他更能夠接納本土的

³⁶ 見趙剛：〈認同政治的代罪羔羊：父權體制及論述下的眷村女性〉，收於趙剛：《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臺北：唐山出版社，1998年），頁 60。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便曾提到眷村人因為不會聽、說臺語而無法進入本土企業工作，語言能力影響謀職的情形，見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 84-85。

人情事物；在接納的同時，也能將自己的文化理解帶給他人。這種族群間彼此溝通、融合、相互理解、和諧相處的面貌，一樣投射在小說中其他重要人物朱之道和黃河清身上，他們和杜小甫一樣都是娶臺灣本地人為妻子，並且夫妻感情甜蜜、相處融洽。反而是另外兩名外省籍身分的人物溫玉棠和歐陽身，娶的都是外省妻子，不是家暴就是貌合神離，而本省妻子的篤實、勤勞、懂得如何過生活，反而是最佳伴侶。

由於對於臺灣認同，所以雖然朱之道、杜小甫不見得認同小說中臺灣青年陳天保「臺獨」的政治理念，但是他們採取現實態度，而將選票投給陳天保。朱之道認為投給陳天保就是「投給春天投給光明投給青春投給希望」，因為「他和咱們坐在一條船上，同生共死，比兄弟還親」（《與山有約》，頁 227），這無異是強調政治上的世代交替與本土價值，不分彼此方能給這塊土地帶來新的契機與面貌。張放小說中的小人物雖然固執、實心眼，但是意識上並非沒有變化的可能。³⁷

1998 年姜穆曾在〈張放的文學天地〉一文評論張放時，論及「鄉土文學論戰」時張放的冷眼旁觀，並述及其民族主義態度：

張放讀書博雜，精於近代文史……近代史，事關及身，不可不知，這是他的民族主義自然形成的過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苦難，就已在血液裡流淌，最近又碰到一些民族的叛徒，要建立臺灣民族，激起張放強烈的中華民族的認同，乃是極其自然也是必然的事。在加上臺灣接受的外來文化，由博而約，這種民族大愛，於焉形成。張放是在這種矛盾荒謬的世界中委身立命。³⁸

³⁷ 循著這樣的思考，張放在最後一本創作的小說中《豔陽天》（2013）中寫道：「臺灣的老芋仔，並不是老共的俘虜；臺灣跟中國大陸早已分裂成兩個獨立國家了。只是臺灣小了一點兒，慚愧。」（《豔陽天》，頁 209）清楚的表明其政治思考。不過這裡的敘述未必能夠以我們現今喧擾的「統／獨」政治光譜來理解。一如《與山有約》的杜小甫，對於臺灣長期養育了他新的生活充滿感激、其後的《濁水溪傳》也提到：「吃西螺米，喝濁水溪水，娶眉埔鎮女孩，相親相愛，度過數十春秋，這兒是家，你能不愛？」（張放：《濁水溪傳》（新北：詩藝文出版社，2010 年），頁 128）皆重複地敘述他對臺灣本土家園的熱愛。《濁水溪傳》中的主角之一山東人于瑞，晚年發出嘆語：「什麼獨派、統派，我是濁派，濁水溪派！」（《濁水溪傳》，頁 200）就像張放小說中常藉由精神失常的瘋言瘋語，吐露不被主流論述所接納的真心話，表明不願被政治歸類的心聲。他真正的歸向是人民與土地，不是任何政治黨派。

³⁸ 姜穆：〈張放的文學天地〉，《更生日報》第 20 版，1998 年 2 月 8 日。

自姜穆論述來看，其所形容的「荒謬」與「矛盾」，正是潛藏許久，漸漸在九〇年代以後獲得發言權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關照和張放同世代外省作家評論時，我們可將之作為一種世界觀的參照來理解，其措詞中可見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信念以及對臺灣民族主義的看法。姜穆或為張放友人，以強烈的中華認同來詮釋張放；我們實自張放的作品讀到不同的可能性。他在態度上或不盡然認同走向獨立的臺灣民族主義，他卻也並不以為此是「荒謬」，未必講求純粹的大中國文化。小說中的人物和陳天保站在一起，不是對於臺灣民族主義的「妥協」，而是情感上的契合與對現存官僚和權力的不滿。陳天保和杜小甫與朱之道，跨越不同族群歷史經驗，彼此相知相惜，同樣是站在要求正義的理想性位置，那麼不同族群即使在統獨問題上看法不同，也能為了臺灣的共同未來而連結，證明了作者在愛與包容上的和諧理想。

（二）踏實可愛的老兵

張放在人物塑造上有明顯的喜好，他對於底層群眾有偏愛，如《與山有約》的主角杜小甫，是粗魯無文的莊稼漢，具有堅毅、勤奮、耿直的品格；相反的，許多活在過去，彷彿得了官癌的投機者、官僚、上層階級則是張放所厭惡的。

小說中批判最力的對比人物為鎮公所兵役課課長歐陽身。早年歐陽身曾審訊逼供朱之道，他深知朱非共產黨人，為求晉升仍施以刑求，在他手下屈死的冤魂眾多，而如此人物反而受到最高統帥表揚，上層官員如何顛預，可見一斑。又歐陽身晚年接任「長青聯誼會」，乃為了選舉和勢力擴充編制，杜小甫一再痛聲批評：「什麼時代了，歐陽身這個老官僚還想撈一票，真他娘丟人現眼！」「吊死鬼搽粉——死不要臉麼！」「這些老不死的官僚就是不甘寂寞！」或是「他從心底瞧不起這些飄洋過海來臺的官僚政客，他們在毛澤東、朱德、林彪面前是軟腳蝦、落水狗，但是站在自己同胞面前卻驕傲自滿，彷彿高人一等。狗日的！」（《與山有約》，頁184）接著又透過敘事者補充評論歐陽身，「他思維與健康情況已和現實社會脫節」、「歐陽身是外省人，他具有打腫臉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性格特點」（《與山有約》，頁212）等等，藉由杜小甫與敘述者之口，作者渴求正義、批判舊官僚的形象已經呼之欲出。張放過海從軍，長期在軍中系統服務，如此直率爽明的痛斥官僚政客嘴臉，在同時期的外省小說家中可說獨樹一格。

所以，張放也給予歐陽身「應有的」報應，使他生前不能人道，死後被三個兒子福、祿、禧棄之不顧。相反的，張放在形塑杜小甫時，一反社會現實景況中老兵在婚姻狀態上的弱勢，作家將所崇敬的底層英雄杜小甫——英雄配美人，杜小甫自有許多女人愛著他；他充滿男性「雄風」，性能力強，對小說中的女性有「致命的吸引力」。杜小甫生前充滿活力，死後讓朋友妻子無限懷念，可知對這兩樣人物作者在形象塑造上的喜好與善惡分明，也可見作者對道德價值的固守和肯定。

張放肯定底層群眾的樸實與直樸，肯定他們踏實生活與土地間親切的關係。張放筆下的底層人民知勞苦、具韌性，他們擁有磨難的生命，同時也有苦難生命得來最質樸的智慧、最豐沛的愛與關懷。他們知道務實，也曉得感恩，杜小甫心繫營長段喚的照顧、妻子阿春的柔情、受麻里山（臺灣的象徵）的養護便就努力回報，生死以之。³⁹也因此，張放寫出的是老兵的精神、尊嚴與光輝。他們忠誠，但並不愚昧；他們雖然年老，可是還有活力，有解決事情的能力。他們心知政權的欺罔與僵化，更清楚了解自己力量的渺小，服從是身為軍人長期以來的訓練，不過也有自生命經驗得來的智慧。所以杜小甫縱然「愚忠」，敘述者評判他的角度卻很特別：

老杜的最大缺點，除了老牛筋固執，另外就是順毛驢：你說他胖他就喘，你誇獎他工作賣力，他會夜以繼日不眠不休即使累出肝病肺病風濕關節炎也樂此不疲。老營長對他的讚美，雖帶有玩笑性質，杜小甫卻下決心，堅守崗位，高舉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五大信念旗幟，為實現鞏固臺灣光復大陸而奮鬥。（《與山有約》，頁 125）

由於過度的質樸執著，反而生出讓人景仰的個人品格，而超越了被意識形態所操弄的底層形象。故而，麻里鎮長簡添木將建設山頂公園的任務託付於杜小甫，杜小甫憑著當工兵的技術與對麻里山的熟悉，他便也就公而忘私、不計利益的全然付出，而這種默默無名、崇實、感恩的人生態度，才

³⁹ 最具體表露此一想法的是張放《水長流》中的小說〈臺北第一味〉。〈臺北第一味〉敘述在三張犁開設牛肉麵館而生意興隆的山東老芋仔賈開沂，在九二一地震的時候以「范倫」之名捐助兩千萬元。文中敘述賈開沂不求名聲的捐出巨款「是為了回饋這個讓他終身難忘的海島」、「用范倫是為了思念提攜他的長官」見張放：《水長流》，頁 263。賈開沂在人格的塑造上與杜小甫也有所雷同。

是張放讚揚的。然而如此的人物張放也悲觀的認為他們不可能在歷史中被認識，張放在寫《與山有約》的前一年，已寫有長篇小說《海兮》。《海兮》中便這麼形容：

大陸來臺灣一百多萬人，龍蛇混雜確實也有不少埋頭工作、默默無聞的人，可這些好人卻像土撥鼠，永遠埋藏在地層下，露不了頭。⁴⁰

在以底層知識分子為主角的《海兮》中，有為有守的知識分子不被了解，反而人格卑劣者平步青雲。張放小說多採善惡分明的人物寫作方式，從呈現方式來看，張放對於官僚系統可說是厭惡且灰心至極；隨著歷史浪濤，一代新人換舊人，這些底層的小人物又將被輕易遺忘。張放晚年的寫作仍貫徹此一思考，他所出版的「海峽三部曲」、⁴¹「邊緣三部曲」正是為歷史的補遺，也是對掙扎於底層的外省人的致敬。

與張放年紀相近的作家，近幾年來紛紛以大部頭的自傳或是散文來敘寫自己的生命，如齊邦媛、王鼎鈞、桑品載、尉天驄等人，而張放則是選擇以「小說」來寫。「自傳」的寫作雖力求真實，但有時也因為個人主觀的障蔽或是傳主有意規避難堪或不願提及的往事，而有某種程度的虛假。不過，「自傳」此一文學類型被要求真實誠懇的寫作態度仍是必然的，而小說則以「虛構」作為小說文類重要的特徵。即便有些小說可能與作者本身的真實人生經驗高度重合，虛構卻仍是小說的當行本事。我們允許小說作假捏造，但對於自傳的造假，卻會感到違背作品的倫理，覺得不甚道德。

敘事必然具有開始、中間與結束，它是一連串事件組織成獨特解釋意義的過程。引入敘事治療的角度來說，敘事者對於故事情節和角色具有主導性，並推論出事件的因果關係，使人將混亂的生活現狀，組織出秩序，並賦予意義。李克爾（Paul Ricoeur）把這種恢復秩序的歷程稱之為「情節化」，就是把這一連串事件組織進情節之中。⁴²

⁴⁰ 張放：《海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頁190。

⁴¹ 「海峽三部曲」為《海燕》、《天河》、《海客》，皆由新北市詩藝文出版社出版。不過《海魂》內容是1996年曾出版的《海兮》；《與海有約》是1997年曾出版的《與山有約》，如此將之作為系列作品出版，自有強調、突出底層外省人命運的效果。

⁴² 黃素菲：〈敘事治療的本質與精神〉，收於〔澳〕艾莉絲·摩根（Alice Morgan）著，陳阿月譯：《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頁13。

我們以小說研究的角度來說，小說創作的過程雷同於敘事治療的過程。作者將宇宙中紛雜的創作材料進入創作視野之中，將之成為寫作素材，進一步選擇、陶融之後成為創作的題材，當作者給與題材因果、組織秩序與情節結構、主題價值的時候，則成為了小說。不同作家對自己的生命經驗有不同的處理方法，有創作者的小說內容完全離開自己的生活場域；但也有些創作者的小說內容與自己的生命經驗具高度重合。張放將生命中的重要事件，故鄉的生活、少小離家、隨著學校渡海來臺、從軍當兵、探親返鄉、從事文化與教育活動、在臺灣落地生根等等都融入小說中寫作，很顯然屬於後者。而這當然也不只是他個人，同時是許多 1949 年離鄉來臺的人的軌跡，他對自己的創作具有紀錄他們一代人共同命運的道德使命感。

同中有異的，張放所呈現的遷臺後勞動者身分和自己長期從事文化工作仍有所距離。不僅如此，甚至與社會學者透過田野調查所尋訪的老兵樣貌也是有距離的。根據吳明季進入田野調查的經驗論述花蓮外省老兵的流亡處境時，曾指出老兵失落話語有三重處境：第一重失落話語是老兵處在「與瘋子、白癡、腐敗垃圾為伍」的象徵性位置；第二重失落話語是老兵所遭遇的流亡處境無法言說；第三重失落話語是臺灣社會偏遠鄉下老人普遍的處境。而其中以第二重失落話語的結構性失聲最為複雜，部分原因是流亡經驗受政治語言干擾，另一部分牽涉到流亡者本身篩選過的記憶與遺忘，最後一部分則在流亡的虛空本質。⁴³

一如段彩華《北歸南回》老榮民在八〇年代末期聽到廣播中的歌曲：「三百六十五里路／年年的度過／過一日行一程／……三百六十五路哨／從故鄉到異鄉／三百六十五路哨／從少年到白頭」心裡想的是：「這不是渙散人心、打擊士氣的灰色音樂嗎？三十多年來，他聽慣了軍歌和戰鬥樂曲……難道廣播電臺被人滲透了嗎？連這樣污染心靈的調子都播送出來？」還想打給有關單位，檢舉作詞作曲者，以求查禁。⁴⁴明明是唱盡老榮民身世的歌曲，得到的第一印象卻不是共鳴，而是靡靡之音會使士氣消沉。長期以來軍人所受的教育與訓練，使其意識形態深入內心，主體性喪失，所思所想盡是統治者話語，如此也使得他們真實的人性與情感被隱蔽、甚至扭曲。

⁴³ 吳明季：〈三重失落的話語——花蓮外省老兵的流亡處境及其論述〉，收於李廣均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年），頁1-47。

⁴⁴ 段彩華：《北歸南回》（臺北：聯合文學，2002年），頁8。

老兵長期意識上籠罩在反共的大蠱之下，口號、教條，成為深入意識的行動準則。當然，另一方面這同時也呈現了老兵「退一步即無死所」的恐懼縮影，而因此變得黑影處處。於是，他們的掙扎被封存在政治一致性的話語假象之中，對黨國的長期依存下，主體在意識形態上與之作某個程度的認同，而在抗爭能力上鈍化與失語。

社會學家汪宏倫曾於〈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一文指出戰爭本身有其框架性。他在該文說明了「戰爭之框」的概念，詮釋戰爭之框有兩種意義，一是指戰爭所創造出來的認識框架，二是指人們藉以界定、理解、詮釋戰爭及其遺緒的認知框架。在現代的戰爭之框經常涉及國族框架；並非所有的成員都被動員直接參與戰爭，但是「戰爭之框」卻提供了國民全體理解與詮釋戰爭的框架。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會被廣泛的動員涉入戰爭之中。戰爭之框不僅是區分敵我、建立主體、鞏固內部，還必須提供救贖，對戰爭的任意性賦予意義。歌頌暴力、表彰烈士英雄、鼓吹犧牲生命，都是戰爭之框所必須樹立的價值觀。⁴⁵

自汪宏倫指「戰爭之框」來理解的話，外省老兵長期以來都在國共內戰的戰爭框架之中認知自我、界定自己。然而，從1991年總統李登輝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止兩岸對戰狀態，間接代表承認了中共政權之後，這也表示著原有戰爭之框不再有充分的詮釋功能。國民全體尚且要經歷一段調適過程，更何況是如老兵、或者是張放等隨同國民政府來臺的外省人？走過國共內戰，如何在已漸失效的戰爭框架之後重新尋找主體價值，跳出如朱之道的悲劇，恐怕是張放所著意的事。

從上兩節的分析，我們的確見到由於流亡過程本身的虛空本質，而導致張放小說中人物的無告；但是非常不同的是，我們自《與山有約》也可以看到杜小甫的形象既非如田野調查所述，是處在「與瘋子、白癡、腐敗垃圾為伍」的象徵性位置，也不是強烈受到政治語言干擾，而導致失語的樣貌。杜小甫質樸、熱忱、讓人喜愛，熱愛臺灣人、事、物，熱愛臺灣鄉土，和臺灣具有和諧融洽的關係。張放在人物形象上有其不「寫實」的一部分，而呈現濃厚的理想性，比起一味的表現底層的有多麼失落、老兵有

⁴⁵ 汪宏倫：〈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節結構與認識框架〉，收於蕭阿勤、汪宏倫主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年），頁388-389。

多麼黑暗悲傷，呼喚群眾對他們的關懷，張放反是去呈現底層的外省老兵自身的光彩。

他筆下的主要人物在意識上的自覺或說是反叛國民黨的程度偏高，且擁有滿滿的活力，對臺灣情感的表露異常明顯，他們在臺灣不論是經商、開工廠、辦學校、種果樹、從事文化活動或基礎建設工程等等，以不同的方式豐富臺灣本土。

和我們對於第一代外省人的普遍性認識不同，從他解嚴後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讀到他對外省官僚人物的批判；可是相對的，小說裡卻讀不到他對本土派的批評。筆者並不認為這表示張放對於本土派毫無批判，而是對於本土的愛護而忽略可能的衝突。

「沒有根，生命是需要勇氣的」——這是張放生平常說的話。⁴⁶而他卻也試圖在敘事中種下新的根，展現了他面對生命與未來的勇氣。九〇年代以降第一代外省作家紛紛出版自傳，回顧過往；張放則在寫實主義小說中重託理想，來面向政治現實。張放小說的光采，在於身為一名 1949 年離散來臺的中國人，既無力改變現實，卻勇於走向將來的精神形象。如同杜小甫般，張放筆下的人物形象似讓人覺得理想太過，但此一「替代故事」解釋了一代人由大陸至臺的歷史經驗，以及這個歷史經驗與現階段的關連，成為一種邁向未來的實踐。

張放的小說〈斷頭河〉曾經以斷頭河譬喻離散來臺的外省人。斷頭河是小說中林紹臣的研究，他自大陸來臺後研究河口學，迷上花蓮溪，研究出花蓮溪是一條「斷頭河」。所謂斷頭河，就是被奪河在襲奪灣以下的河段，因它上游被奪改道，形成源頭截斷現象。它流向不變，但水量減少，流速緩慢。⁴⁷張放便是以「斷頭河」來比喻大陸來臺灣的人。

小說一方面敘述他們的生命猶如「斷頭河」不能再驚起波瀾，但一方面又在林紹臣的形象上給予積極的特質。林紹臣重視眼前的責任，小說敘述他熱愛花蓮溪，熱愛溪岸的自然景物，更熱愛生活在花蓮的人民。他認為嚴重的懷鄉心理將導致精神分裂，曾說：「再過十年、二十年，我還真會忘記黃河，那也怪不了我」（《斷頭河》，頁 258），在臺娶妻生子。張放這樣子重視現實意義，積極、務實的觀點，便類似於杜小甫。透過敘事，張

⁴⁶ 張雪姦：〈不斷寫作的人——記我的爸爸張放〉，頁 291。

⁴⁷ 張放：〈斷頭河〉，收於張放：《斷頭河》（新北：詩藝文出版社，2003 年），頁 265。

放在人物形象上，因此重複的塑造出充滿活力、坦率質樸的「老芋仔」「替代故事」取代全然悲情的無希望形象。這並非代表他們真的忘卻家鄉，或者是他們在心中不再寂寥、邊緣，只是無奈中生活仍有許多不能取代與忘卻的真實情感與價值，他們活得有滋有味。從小說中我們讀出張放不願人們對於外省人的理解只存在平面的象徵位置中，也不願因此簡單的落入離散的虛空裡，而走入「替代故事」的新形象裡。

五、結語

張放反覆寫作的，不是單一事件；若說他著意於事件，不如說他關注的是 1949 遷臺外省人的集體命運——特別是居於底層的知識分子以及老兵。小說中反覆的出現他們自 1949 年渡臺之後，陷入國共內戰的漩渦，在白色恐怖下所受到的政治傷害與影響。他把澎湖山東流亡學生冤案放入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命運來思索，涉及的不只是冤案、假案、錯案，更還有戒嚴下兩岸隔絕、思想控制、言論查禁，而這些都是國共內戰下的結果。

本文自張放的創傷來源的探究出發，再進入張放所思的來臺外省人的歷史命運，而勾勒出小說家內在與外在的敘事動力，最後再論述張放小說身分敘事上的形象特點，試圖分析小說敘事對張放本身的意義，以探析張放解嚴後小說創作的敘事動力。

臺灣歷經長時間的戒嚴統治，張放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不因為來臺外省人的軍人身分倖免於難，而分外痛恨威權的統治手段，直接的揭露知識分子受挫而悲慘的命運，控訴兩岸隔絕造成的心靈毒瘤。同時他也因此覺察到，第一代外省人難以被了解的命運，而顯露一代人命運在歷史長河中被遺忘的憂懼。

張雪嫫曾經描述自己父親張放的創作心理：

（按：他）致力於寫這個「邊緣人」的故事，以一種為這批老芋頭請命的姿態，寫得發癡。他為這批 1949 來臺，當時小青年，如今老死凋零的老兵作傳，而且是全市之外的無名小卒作傳，必然是因為，他是其中之一。他們，少小離家，在臺灣生活了一輩子，但是，內心深處，永遠是邊緣人。⁴⁸

⁴⁸ 張雪嫫：〈不斷寫作的人——記我的爸爸張放〉，頁 290-291。

來臺外省人在探親開放與解嚴之後開始清楚覺知、或是開始在文字中呈露國共內戰、白色恐怖與兩岸隔絕所帶來的惡性結果，戰爭框架的瓦解失靈，使得張放重新思索他們一代的外省人如何被認識與記憶的歷史課題，其中充滿不被理解的憂愁，也暗藏空虛落寞的邊緣人心理。

在容許虛構的小說文體中，張放方能勾畫一代人的命運和心理。但另一方面，他的晚年寫作不僅是出自於心理創傷與負疚的揭露和歷史檢討，也是為包含自己在內的一代外省人尋求解答，並自敘事中重建了「老芋仔」熱情、樸實的形象，朝向未來。他有淚要流，有話要說；心繫中國，也珍惜臺灣。積極、勤奮、感恩的「替代故事」，成為張放的桃花源，也幫助他找到了文字的歸宿和永恆的心靈王國。⁴⁹

【責任編校：黃佳雯、黃璿璋】

徵引文獻

專著

王鼎鈞 Wang Dingjun：《文學江湖》*Wenxue jianghu*，臺北 Taipei：爾雅出版社 Erya chubanshe，2009 年。

司馬中原 Sima Zhongyuan：《最後的反攻》*Zuihou de fangong*，臺北 Taipei：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Fengyun shidai chuban gongsi，2009 年。

朱天心 Zhu Tianxin：《想我眷村的兄弟們》*Xiang wo juancun de xiongdimen*，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社 Maitian chubanshe，1998 年。

段彩華 Duan Caihua：《北歸南回》*Beigui nanhui*，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Lianhe wenxue，2002 年。

郝譽翔 Hao Yuxiang：《逆旅》*Nilü*，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Lianhe wenxue，2006 年。

張放 Zhang Fang：《遠天的風沙》*Yuantian de fengsha*，臺北 Taipei：黎明文化 Liming wenhua，1982 年。

⁴⁹ 張雪姝曾敘述父親晚年掛念小說的情形：「我的爸爸張放，寫了一輩子，臨終還在寫。呼吸照護中心的最後幾日，他用顫抖的手在白紙上寫，五萬元交張姐。我們困惑，張姐是誰？後來才知道，張姐是他的小說人物。他早已把小說和現實混在一起，我可憐又可愛的爸爸！我相信他是快樂的，他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這就是圓滿了。」見張雪姝：〈不斷寫作的人——記我的爸爸張放〉，頁 292。

- 張放 Zhang Fang :《春水桃林》*Chunshui taolin* , 臺北 Taipei : 中央日報社 Zhongyang ribao she , 1989 年。
- :《山妻》*Shanqi* , 臺北 Taipei : 巨龍文化公司 Julong wenhua gongsi , 1993 年。
- :《海兮》*Haixi* , 臺北 Taipei : 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 , 1996 年。
- :《情繫江家峪》*Qing xi jiangjiayu* , 臺北 Taipei : 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 , 1996 年。
- :《大海作證》*Dahai zuozheng* , 臺北 Taipei : 獨家出版社 Dujia chubanshe , 1997 年。
- :《與山有約》*Yu shan youyue* , 臺北 Taipei : 獨家出版社 Dujia chubanshe , 1997 年。
- :《海魂》*Haihun* , 臺北 Taipei : 昭明出版社 Zhaoming chubanshe , 2001 年。
- :《水長流》*Shui changliu* , 新北 New Taipei :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Taipeixian zhengfu wenhua ju , 2003 年。
- :《斷頭河》*Duantou he* , 新北 New Taipei : 詩藝文出版社 Shiyiwen chubanshe , 2003 年。
- :《海燕》*Haiyan* , 新北 New Taipei : 詩藝文出版社 Shiyiwen chubanshe , 2006 年。
- :《天河》*Tianhe* , 新北 New Taipei : 詩藝文出版社 Shiyiwen chubanshe , 2007 年。
- :《春潮》*Chunchao* , 新北 New Taipei : 詩藝文出版社 Shiyiwen chubanshe , 2008 年。
- :《寒流過境》*Hanliu guojing* , 高雄 Kaohsiung : 春暉出版社 Chunhui chubanshe , 2009 年。
- :《濁水溪傳》*Zhuoshuixi zhuan* , 新北 New Taipei : 詩藝文出版社 Shiyiwen chubanshe , 2010 年。
- :《台北茶館》*Taipei chaguan* , 臺北 Taipei : 秀威資訊 Xiuwei zixun , 2013 年。
- :《豔陽天》*Yanyang tian* , 臺北 Taipei : 秀威資訊 Xiuwei zixun , 2013 年。

- 張雪姦 Zhang Xuerou:《唐傳奇中的「異人傳」》*Tang chuanqi zhong de "yiren zhuan"*,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 2001 年。
- :《天地之女——二十世紀華文女作家心靈圖像》*Tiandi zhi nü: ershi shiji huawen nüzuojia xinling tuxiang*, 臺北 Taipei: 正中書局 Zhengzhong shuju, 2005 年。
- :《當代華文女作家論》*Dangdai huawen nüzuojia lun*, 臺北 Taipei: 秀威資訊 Xiuwei zixun, 2013 年。
- 琦君 Qi Jun:《菁姐》*Jingjie*, 臺北 Taipei: 爾雅出版社 Erya chubanshe, 2004 年。
- 蕭阿勤 Xiao Aqin、汪宏倫 Wang Honglun 主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Zuqun, minzu yu xiandai guojia: jingyan yu lilun de fansi*,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shehuixue yanjiusuo, 2016 年。
- [澳] 艾莉絲·摩根 Alice Morgan 著, 陳阿月 Chen Ayue 譯:《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Cong gushi dao liaoyu: xushi zhiliao rumen*, 臺北 Taipei: 心靈工坊 Xinling gongfang, 2008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新地文學》編輯室 *Xindi wenxue bianjishi* 編:〈張放先生著作書目〉“Zhang Fang xiansheng zhuzuo shumu”, 《新地文學》*Xindi wenxue* 第 24 期, 2013 年 6 月。
- 吳明季 Wu Mingji:〈三重失落的話語——花蓮外省老兵的流亡處境及其論述〉“Sanchong shiluo de huayu: hualian waisheng laobing de liuwang chujing ji qi lunshu”, 收入李廣均 Li Guangjun 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Li yu ku: zhanzheng de yanxu*, 臺北 Taipei: 群學出版社 Qunxue chubanshe, 2010 年。
- 胡台麗 Hu Taili:〈芋仔與番薯——臺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Yuzai yu fanshu: taiwan 'rongmin' de zuqun guanxi yu rentong”, 收入張茂桂 Zhang Maogui 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Zuqun guanxi yu guojia rentong*, 臺北 Taipei: 業強出版社 Yeqiang chubanshe, 1993 年。

張放 Zhang Fang :〈漏船載酒泛中流——寫長篇小說《天譴》的隨想〉“Louchuan zaijiu fan zhongliu: xie changpian xiaoshuo *Tianqian* de suixiang”,《文訊》*Wenxun* 第 165 期, 1999 年 7 月。

張雪姸 Zhang Xuerou :〈不斷寫作的人——記我的爸爸張放〉“Buduan xiezuo de ren: ji wo de baba Zhang Fang”,《新地文學》*Xindi wenxue* 第 24 期, 2013 年 6 月。

趙剛 Zhao Gang :〈認同政治的代罪羔羊：父權體制及論述下的眷村女性〉“Rentong zhengzhi de daizui gaoyang: fuquan tizhi ji lunshu xia de juancun nüxing”, 收入趙剛 Zhao Gang :《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Gaobie duhen: minzhu weiji yu chulu de tansuo*, 臺北 Taipei: 唐山出版社 Tangshan chubanshe, 1998 年。

應鳳凰 Ying Fenghuang :〈書話張放〉“Shu hua Zhang Fang”,《新地文學》*Xindi wenxue* 第 24 期, 2013 年 6 月。

學位論文

張文竹 Zhang Wenzhu :《張放小說中的澎湖書寫》*Zhang Fang xiaoshuo zhong de penghu shuxie*, 臺北 Taipei: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Taipei shili daxue zhongguo yuwenxue xi shuoshi zaizhi zhuanban shuoshi lunwen, 2019 年。

報紙文章

姜穆 Jiang Mu :〈張放的文學天地〉“Zhang Fang de wenxue tiandi”,《更生日報》*Gengsheng ribao* 第 20 版, 1998 年 2 月 8 日。

網站資料

李筱峰 Li Xiaofeng :〈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類型〉“Taiwan jieyan shiqi zhengzhi anjian de leixing”, 參見：<http://www.jimlee.idv.tw>, 瀏覽日期：2005 年 10 月 4 日。

陶曉嫻 Tao Xiaoman :〈穿越臺灣近代史的老兵趙衍慶〉“Chuanyue taiwan jindaishi de laobing Zhao Yanqing”, 參見：<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21/510676/> 2014 年 11 月 21 日, 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27 日。

